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超五成——

数字经济为山西转型赋能

本报记者 梁 婧 李红光

“轻点手机就能找到合适货源，不再为车辆空驶发愁；通过线上结算，回款周期缩短，也降低了拖欠运费的风险。”今年5月，个体货车司机窦师傅在山西快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APP平台注册后，接到了几单长途生意，并顺利拿到了运费。

不仅是物流行业，数字技术在山西各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智慧矿山建设入选国家典型示范；在用数据中心利用率位居全国前列；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获批，成为“十四五”期间全国首个启动申报并获得批复的直联点……数字融合在山西工业经济领域加快落地。

数据显示，上半年，山西新动能增势强劲，互联网相关产业等新兴服务业引领增长。1月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69.3%。在全省基础设施投资中，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56.2%。新兴产业持续扩大投资，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57.1%。

数字经济正成为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山西省工信厅副厅长刘勇告诉记者，目前山西在用、在建数据中心设计标准机架达到37.78万架，比去年同期增长61.7%。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山西数据中心发展总指数继续提升至全国第七位。百度公司在综改示范区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单体标注基地。精英数智、罗克佳华、全球蛙、快成物流等一批本土企业快速壮大，数字化产品和平台涵盖了能源、环保、零售、物流等各个行业领域。“我们正全力打造多元应用场景，逐步释放数字价值。”刘勇说。

相比传统工业强调“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链控制”模式，数字经济发展更需要“圈合作”的生态战略思维，其发展离不开聚合各类数据要素、人才要素、数字技术、平台企业的生态圈。山西要实现转型，必须打造数字生态，提高数字治理能力。

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于2020年10月落地，园区以数据流量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为切入点，以市场化产业化的创新运营模式，带动全国数据流量资源向山西跨区域集聚，吸引数字物流、数字电商、数字能源等数字经济企业群体持续落地，目前已有超70家数字经济企业入园。在数字产业形成集群基础上，依托海量多维的数据资源优势，与本地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带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纵深发展，为传统行业转型发展蓄势赋能。

“我们的大数据、信息等高成长性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部分细分领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山西省工信厅新闻发言人、副厅长张占祥表示，下一步，山西将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打造新动能新引擎，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经济产业核心竞争力。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育先机开新局

湖南常宁市天堂山上，数十台风力发电机擎天矗立，壮美如画。近年来，常宁市充分利用周边高山生态环境优美、风力发电场多的资源优势，拓展景区文旅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助推地方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唐雍钧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火热的建设项目背后，一项静悄悄的改革正在推进——“五票”统筹。

何谓“五票”？这是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得以推进的5张“门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地票”、征收安置房源指标的“房票”、水系占补平衡指标的“水票”、林地占补平衡指标的“林票”及绿地占补平衡指标的“绿票”。

作为建设项目资源性指标，企业经常为获得这“五票”而奔波。2020年，浦东率先在全国实行“五票”统筹，出台了实施办法及操作细则，明确提出各部门根据区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和实施库年度计划，确保项目报批前落实各项指标的平衡计划，重点对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民生项目应保尽保。

“‘五票’审批涉及浦东新区发改委、建交委、生态环境局等多个部门。过去，建设单位要‘挨家挨户’找票源，政府部门负责审批，容易出现‘四缺一’‘三缺二’，既影响项目推进，也造成指标闲置。”上海浦东新区重大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杜玉良说，“通过制度创新，我们已实现各行业主管部门主动统筹、筹措提供。”

这一改革再次创造了全国第一：通过政府投资项目资源性指标配置机制系统化改革，将原来的建设企业“上门求票”转为指标管理部门“主动供票”，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杜玉良说，以往“五票”筹措往往在重大工程启动后才开展，且这些指标多由建设主体自行编制平衡方案后再提交主管部门审批，经常影响工程项目进度。如今，“五票”筹措好再动工，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提高，也为今后建设做好了储备。2020年，有262项重大工程实现“地票”“房票”应供尽供，“水票”“林票”“绿票”基本落实，共计完成开工35项、竣工43项，年度完成投资超年初计划7%。

突破瓶颈：让企业心无旁骛创新

“创新药”是浦东重点培育的六大硬核产业之一，不断深化的改革举措助推产业快速发展。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是上海近年来着力推进的先行先试改革之一。这一制度将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将产品委托给不同的生产商生产，从而给创新型医药企业“松绑”，让其集中精力做研发。2015年，上海成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如今，改革屡屡突破瓶颈，创新成果亮眼。

“华领医药是这项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国外有相对成熟的制度，上海药监部门也在积极推动，我们参加了多次调研。这项改革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医药产业板块，产业链企业实现更专业化的运营，科技型企业能够专注创新。”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首席制造官佘劲说。

“过去在国内，药品注册与生产环节一直‘捆绑’在一起，药品研发机构如果没有工厂，就不能申请药品上市。”佘劲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此前国内研发机构在药品二期临床试验后，往往面临两种选择，或是自己办厂搞生产，或是将研发的“青苗”卖给别人。

改革试点后，药品研发企业可以申请药物上市批准，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此举破解了研发人员“卖青苗”之痛，打通了药品创新研发的“最后一公里”，新药上市大大提速。佘劲由衷地说，“上海药监部门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他们经常与企业交流，引入国外经验鼓励创新”。

那么，对有工厂的医药企业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在哪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王刚博士告诉记者，这项改革促进了行业发展，同时也厘清了监管的责任，谁是持有人谁就要对质量体系负责，要对药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

“我们在苏州与上海建有2个生产基地，改革后，公司对于生产产能的协调变得更加灵活。更重要的是，负责生产的子公司不仅要进行产品质量的自我监管，同时要接受母公司的质量监管，形成质量双重保证，确保产品在研发、生产、检验等全生命周期都处于严格质量管控之下。”王刚说。

浦东，不仅是上海的浦东，更是中国的浦东、世界的浦东。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打出了一张王牌。在新的历史方位，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再次打出这张王牌，影响深远。

时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历史使命，定位之高、期许之重、空间之大、政策之实前所未有，为浦东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吹响了冲锋号角。

潮涌东方，势不可挡。“浦东毫无疑问应当成为人类一段卓越的历史，而且是一段充满激情、浪漫和具有浓浓上海味道的历史。”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浦东史诗》中这样写道。

展望下一个30年，浦东将勇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奏响新时代的“中国乐章”。

经世言

民意调查逐渐沦为西方政治工具

叶 俊

随着美国推出“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战略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仍沉醉于自封的“国际社会”幻想中，把自己的价值观标榜为人类价值观，把自己的舆论等同于国际舆论，动用各种手段给本国“贴金”，对他国进行抹黑。其中，民意调查就是其惯用的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手段。在彭博社发布的“全球抗疫排名”中，逾3600万人感染、60万人死亡的美国，竟然成为“全球第一抗疫大国”。这背后体现的是西方国家的狂妄自大和傲慢，也表明民意调查等各类排行榜在西方已经沦为政治工具，失去了科学价值。

1824年7月，《宾夕法尼亚人报》进行了第一次“无党派偏见的”大选模拟投票，被视为民意调查的源头。由此算起，民意调查距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并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术领域广泛应用，在西方选举政治和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西方所谓的选举政治归根到底代表的是政党斗争。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胜选再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西方民主模式中的政党斗争日益激烈并裹挟着民意。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机构开始参与政治斗争，成为西方国家内部政党斗争的工具，过去那种“无党派偏见”的民意调查正逐渐成为历史。与此同时，美国政党选举中的各种斗争、谩骂和攻击，早已让美国民众对两党轮流坐庄失去信任，“选举制”变成了“选举秀”，目的只为吸引更多民众眼球，获得所谓的选票。基于此背景而开展的民意调查，也卷入了政党斗争，既被歪曲的民意所误导，也被政党斗争所利用，只不过是政治游戏。

如今，民意调查更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一部分。各类所谓民间机构和中间立场的民意调查报告，在西方中心的主导下开展各种国际民意调查、排行榜，不讲科学，不顾事实，对西方国家进行各种美化，对非西方国家则进行丑化。

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一轮有关中国的民调为例，民调结果宣称“美国国际形象反弹，中国国际形象依然呈负面”。这个所谓的“国际性民调”，仅在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而这17个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属于西方阵营。如果去亚非拉国家开展民调，皮尤会发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远远好于美国。但为了宣扬西方中心、白人至上，皮尤不会也不敢去做这种广泛而客观的国际性民调。

民意调查的初衷是希望借助数据反映民意。在互联网环境下，民意调查网络化，各类调查越来越多，人们也习惯了各种投票。推崇者认为，民意调查结果等同于个人政见或意志的集合，可以作为政党施政和外交战略的依据。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民意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政党、商业、媒体等都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从而使民意受到利益集团左右。

首先，民意调查的民意可能是被煽动的民意。无论是内部政党斗争，还是对外舆论攻击，西方国家擅长运用媒体煽动民众。一旦民众被煽动起来之后，这种所谓的民意就不是客观的。所谓民意调查就失去了应有价值。

其次，民意调查的民意可能是被误导的民意。部分西方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片面性报道，甚至故意采用滤镜、剪辑、捏造等方式丑化、抹黑中国。这些报道会对民众产生严重误导作用，使得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民众要么根本不了解中国，要么所了解的中国都是片面的甚至负面的形象。对这种被误导的民众进行民意调查，其基础就有问题，遑论调查结果。

再次，民意调查的民意可能是被代表的民意。民意调查的调查对象选择关系调查结果，调查对象的选择性会破坏调查的公正性。例如，皮尤对中美国家形象的调查，调查对象选择集中在西方阵营的国家和地区，而对中国、对中国的友好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则不敢开展调查。这种在“小圈子”内部的调查结果，其所谓的“民意”是不客观的，真正的民意被少数群体代表了。

正是因为民意不再是客观的个人意见集合，且主观性和工具化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在看待西方所谓民调结果时，必须要提高警惕。尽管民意调查在西方国家被作为民主的工具存在，但它同时也是政党斗争的工具，是对外搞文化霸权、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而不是民主本身，更无法代表真正的民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忠诚赤胆铸尖刀

——记陆军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特战营营长刘近

巍峨耸峙的贺兰山下，驻守着一支闻名遐迩的特种部队——陆军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这支历经80余载烽火征程、由抗日名将彭雪枫亲手创建的英雄部队，如今又走出了一位身怀绝技、谋战胜战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特战营营长刘近。

“到最艰苦的地方，当最优秀的兵。再苦再累，也要干出一番事业。”17年前，带着对家乡亲人立下的誓言，刘近来到千里之外被誉为“雪枫旅”的英雄部队。

2014年6月，担任特战九连连长的刘近牢牢把握红色血脉这个根本，以此激发官兵们的荣誉感，促进战斗力生成。他说：“一个连队没有自己的历史，官兵的荣誉感就不强，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就不够。”

为此，刘近下大力气挖掘整理连队红色家谱，主动联系曾在连队任职的多名老连长、老指导员，请他们共同梳理连队光荣史。

经过将近一年的收集整理，连队将历史照片制作成展板，官兵们的思想从中受到强烈震撼。为进一步表彰先进，他们还把连队许多先进个人的事迹载入连史，成为连队开展教育的活教材，激励官兵续写荣光。

在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九连从后进变先进，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担任营长后，刘近从点点滴滴做起，激励官兵赓续传承“雪枫旅”忠诚于党、矢志强军的红色血脉。新兵入营，先去旅史馆向先辈“报个到”；部队出征，要面向彭雪枫雕像“宣个誓”；出错违纪，要到反思墙前“认个错”。刘近引导官兵与先辈“对话”，教育部队与先烈“看齐”。

“特种兵就是要有血性，一点伤疤算不了什么！”这是刘近的口头禅。

2017年，刘近带队参加国际军事比武。一路上，他们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敢于通过别人不敢通过的丛林，勇于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最终战胜对手，夺得金牌。

“训练不怕苦、任务不怕难、打仗不怕死。”担任营长以来，刘近一方面组织各连优秀教练员交叉互学，取长补短，同时打乱建制，以特战小队为单位让他们互为对手，实战对抗；另一方面将出国联训、比武的经验带回来，将军内特种体能、战术训练专家请上门，不断清除训练盲区。多年来，特战营先后攻克“高原伞降战术”“陆空立体破袭拔点”等20余个训练和作战难题。

平时练就硬骨头，战时才能骨头硬。2018年，刘近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军营中，刘近始终与战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想战士所想、急战士所急、解战士所忧。

一次，部队在高原驻训。几名战士第一次来到高原，第二天便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刘近来到炊事班，亲手熬了一锅白米粥，端到几名战士床前，看着他们喝下才放下心来。

文/张圣涛 干作余 高 腾

（据新华社电）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国门坚盾”树党建品牌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七一”前夕，厦门机场海关机关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是厦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单位。

一直以来，这支守护在祖国东南“空中黄金通道”的“红色队伍”，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论是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还是在优化营商环境的主战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型毒品层出不穷，你能想到糖果、邮票也可能是毒品吗……”走进厦门机场海关“先导课堂”，记者看到该关党员朱舒佳正在为关员传经送宝。

近年来，厦门机场海关创建“先导能力工作室”，发挥业务专家、党员骨干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面授分析、以老带新等传帮带方式，提升监管能力。面对严峻的走私态势，厦门机场海关通过旅检与货运“先导课堂”的带动，根据不同时期的走私动态和规律，及时调整查私重心，灵活采取查缉手段，不断提高海关查缉工作的“快、准、勤”。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厦门空港口岸入境旅客和检疫工作量骤增，局部压力过大、旅客通关战线拉长等问题摆在了厦门机场海关面前。厦门机场海关机关党委以党旗引领战旗，筑牢防疫的铜墙铁壁。党委班子成员带头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第一时间在“战疫”一线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组建党员突击队，153名党员自愿提交请战书。

为提升战斗力，厦门机场海关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打破行政限制，在各班组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并选配优秀党员担任班组长，使得现场防控网络更密，关员人均负荷更轻，旅客通关更快，协调配合更有序。

不仅如此，厦门机场海关还组织党员业务骨干，快速牵头开发“海关检疫E码通”，构建全要素旅客健康管理台账，并在全国海关率先上线。在筑起“防疫墙”的同时，厦门机场海关还优化旅客通关体验，入境人员通过出示健康码即可“一码通关”，实现“数据多跑路、人员少接触、旅客无滞留”。单个航班平均检疫时长由7小时至8小时压缩至60分钟至70分钟，病例追溯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5分钟。

厦门机场海关机关党委书记黄艺表示，厦门机场海关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政治建设作为班子建设的首要任务，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工程，全面推行党支部“堡垒指数”考核体系。目前，厦门机场海关机关党委总结提炼出“聚航号”党建品牌，在其引领带动下，厦门机场海关“快验先锋”“空港明灯”“红色经纬”“全心引航”等17个支部品牌成为一张张叫得响的名片。2020年，该关下属的旅检二科党支部“国门坚盾”党建品牌获评“全国海关党建示范品牌”。

近年来，厦门市大力实施电子信息万亿产业链群培育工程。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产品精密度高，对通关时效、通关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场海关党员干部带头开展业务攻关，推行“远程审核”“线上指导”“网上解答”和“不见面审批”制，率先在全国开通防疫物资通关绿色通道，不断提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水平，压缩整体通关时间。6月以来，厦门机场海关空运进口通关时效在沿海十大口岸中排名第三，出口通关时效在沿海十大口岸中排名第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